

# 中國環保 NGO 的困境與轉型：訪自然之友

王舜薇

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班

西南大旱、舟曲泥石流、紫金礦業廢水污染……，環境問題在中國，不論自然反撲或人為惡因，已經是「大國崛起」之外不可忽視的另一面；因資源開發或興建工廠造成的「環境難民」人數不斷攀升，已經成為中國群體事件主因之一，在看似一發不可收拾的危機中，中國公民社會將如何回應？

這趟北京田野行，我們因緣際會拜訪了中國本土環保組織「自然之友」，與主要工作人員暢談中國環保 NGO 的發展。自然之友（Friends Of Nature，簡稱 FON），是中國最早註冊的民間環保非營利組織之一。成立 16 年來，他們除了在保護雲南滇金絲猴、反怒江大壩、反圓明園鋪膜工程等指標性環保爭議中居領頭位置，也藉由環境教育的不斷深耕，推動公民環保意識的進步。

## 環境問題城市化

FON 現任總幹事李波是雲南白族人，在加入工作團隊之前，已經有豐富的相關經驗，視野橫跨國際與本土。身為少數民族的他，過去相當關注邊疆地區的生態問題，但後來覺得在那些公民網絡貧瘠、自然條件艱苦的地方從事環運的成本太高，也無法回應最核心的問題，於是重新省思路線定位。追根究底，邊疆和鄉村地區的環境問題還是來自於生產消費的供需關係：鄉村供給沿海重點城市大量的自然資源，得到的回饋卻往往是龐大的環境成本和無預警的災難。

據相關資料，2009 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達到 48%，估計 15 年後會達到 70%，這個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城市化的快速進展，也代表著未來城市的消費問題和排污量將更加擠壓鄉村的生存空間。李波認為，要改善中國目前的環境問題，要先從



自然之友總幹事李波。

改變城市生活方式和發展策略開始。以垃圾問題為例，目前城市垃圾多由鄰近郊區承擔處理風險，但這顯然並非長久之計，對於水源、土地的傷害也不容小覷，因此如何從根本改變、重視前端減量，並借重如台灣過去推動垃圾政策和反焚化爐運動的經驗，都是「環境問題城市化」的今天必須採取的思考方向。

## 後「洋奶」時代 NGO 如何回應社會需求

中國 NGO 曖昧的「合法性」問題一直是發展上的絆腳石，不能公開募款的限制也直接影響到 NGO 的資源分配。過去本土 NGO 普遍有接受國外資金援助的情況，但中國近年因為財富積累顯著，國外普遍有不再資助的傾向。雖然以 FON 而言，目前外國資金仍高達總預算七成，但一旦「洋奶」不再，往後資源哪裡來？

李波點出資金對於議題選擇的影響。某些資助者認為，隨著中國的世界地位日益重要，不分地域的環境議題也會向國外「出口」，當中最典型的就氣候變遷。但是一個在人力、資源上有限的組織，是要先因應國際潮流回應氣候變遷，還是先處理最緊迫的水、垃圾等在地問題？這種

方向上的衝突造成某些長期項目（例如環境教育）的經費被縮減，對於以社會培力為導向的組織來說是很大的打擊。

於此相對的，還有來自中國內部的「土奶」。近年中國一些企業家捐款給民間環保組織的案例不在少數，但他們所認識的公民社會價值仍然與 NGO 的方向有些差距。雖然企業捐款立意良善，但相對來說比較短視，認為環境問題可以在純粹技術的改進下解決，因此多選擇有短期效應的技術性的項目來資助，顯示出他們的商業性思考。然而，很多非專業性的環境問題其實與社會整體問題息息相關，很難在短期內解決、做出顯著「成果」。

如何讓組織目標回應社會需求、將本土議題放到更大的框架中去檢視，並向社會展示自己的能力，是任何想持續發展的民間組織都無法迴避的問題。

## 專業化與面向公眾

因為之前在台灣環保 NGO 工作過，上述的困境分析聽起來十分熟悉。要做與值得做的事情永遠很多，人少、錢少卻總是令人頭大。目前中國 5000 家環保 NGO 中，民間性質的草根組織約只有 500 個，從業人員總數 2500 多人，其中很多

還在不同的組織重疊出力。2500 人面對 13 億人的環境問題，著實是一場硬仗。

既然人力是一大問題，那麼廣義的「公眾」到底要如何參與，落實 NGO「面向社會」的訴求？李波認為，環境問題的複雜化，已經使得公眾參與不再是好或壞、贊成或反對的二元對立表達，也不是某個環保團體登高一呼就可以號召群眾，而是要朝向更加專業的政策辯論。例如 FON 每年編纂「中國環境綠皮書」，就是要向大眾傳播民間觀點的環境政策，並在體制內達成政治影響。

但這並不意味著環運必須菁英化。「與其跟官方專家去爭辯工程問題，我們更要追求的是程序正義」。在公民討論的場域中，專業能力是其次，主要是社會是否能夠容納政府政策之外的選擇。不論在中國或台灣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建立，反而讓環運轉為「少數知識份子玩得起的遊戲」。擁有絕對優勢資源的國家，可以動用專家和調查項目替政策護航。因此民間組織能扮演的角色，除了依靠專業性高的會員小組分進合擊提出民間觀點，更要堅守程序與監督社會公義。

其實，相關的爭辯在台灣環運界也不停上演。環保團體在「體制內」的談判桌上，最常被質疑的一點就是「不要只一味反對，請告訴我要什麼？」除了顯現出民間團體對於「專業性不足」的焦慮外，反過來看，社會對於 NGO 的期

待，是否一定得是面面俱到的全知者？要求 NGO 提出全盤政策建言，是否又形成某種英雄主義式的道德束縛？顯然，不論中國或台灣，民間社團對於自身定位的摸索，仍然是進行式。而在 NGO 的運作邏輯中，有一種「以慢抵抗快」的哲學；唯藉不斷對話、改變、尋求最高共識的動態過程，NGO 自成一格的節奏才能站穩腳步。



假日的公民環境教育。

## 後記：與災難共處的時代

李波等人的細膩剖析，讓我對台、中兩地環保 NGO 的異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。不過再多的轉述與討論，也比不上親身體驗來得實在。田野行尾聲，我參加「達爾問自然求知社」主辦的「自然大學」活動，走訪北京的大屯垃圾轉運站，以及北六環小湯山鎮的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。大屯垃圾站主要接收北京社區垃圾，垃圾在此壓縮後，送至阿蘇衛進行後端處置；小湯山鎮距離北京市區車程約一個半鐘頭，因當年曾是「非典」(SARS)期間北京的臨時集中醫療處而聲名大噪；此地的阿蘇衛垃圾場建於 1994 年，是北京最大的「正規」垃圾處理場，綜合了填埋和堆肥處理兩個部份。近期因為政府宣稱既有處理設施逐漸無法負荷垃圾量，欲在此另規劃焚燒場，遭到當地居民抗議，目前項目還處於環評階段。

這一路下來，確實體會到李波所說「環境問題城市化」。從市區往小湯山鎮的路上，穿越城鄉交界，沿途景觀從水泥鋼筋到稀疏矮房；然而阿蘇衛「壯觀」的垃圾山，又提醒我們城市生活



北京阿蘇衛垃圾場一隅。

痕跡的另一種形式，每天每夜不間斷地佔據了鄉村土地。這是一個「與災難共處」的時代：災難不會消失，重要的是人如何與之共處。

兩岸環保 NGO 在發展過程中的困境和社會結構仍有許多可以相互借鏡、參考援引之處；共處世界體系和經濟鍊上的緊密關係，使得諸如環境污染等問題更無法用你丟我撿的模式看待。當「發展至上」的主流思維仍然同時在台灣和中國蔓延時，環保運動不應只是中產階級的贖罪，也並非單純為非人的主體發聲，而是不分地域的生存與人權課題，未來中國環保 NGO 是否有更多政治和社會空間施展理想？值得觀察。